

《歐美研究》第三十一卷第三期 (民國九十年九月), 571-615

©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 「自由派的帝國主義」： 英國對埃政策，一八九三至一八九四

王世宗

台灣大學歷史系

### 摘要

自由主義的信念本與帝國主義不合，但在事關國家利益的外交與帝國政策上，自由黨人終究趨於妥協。十九世紀後期英國自由黨的政治理念固然與保守黨迥異，但在外交上，最終則走向保守主義路線。本文藉著討論羅斯柏理擔任外交部長時英國對埃政策的發展，說明自由黨由反帝國主義形象轉為帝國權益擁護者的變化。文中，分析一八九三年自由黨勝選後羅斯柏理就任外交部長時的政治氣氛以及同年埃及新任總督艾伯斯即位時英埃關係的微妙變化、「艾伯斯政潮」的發展與英國對埃控制力的強化、政潮之後自由黨政府對埃政策路線的調整、一八九四年初蘇丹「邊境事件」的發展與英國領埃威權的鞏固，結論解釋英國對埃政策所表現的「自由派的帝國主義」精神及其影響。

關鍵詞：格蘭斯敦、羅斯柏理、克魯摩、艾伯斯政潮、邊境事件

自由主義講求理性和平，對於帝國主義的侵略壓迫行為本不認同；但凡從政者皆不可能堅持理想的自由主義精神，而不顧國家大利或現實的國際權利爭奪。因此，自由黨的政治意識型態固然與保守主義不同，但在事關國家利益的外交政策上，其作為亦往往與保守黨無異。畢竟沒有任何一個政治團體能擔負「喪權辱國」的罵名而能安於其位。在自由主義發源地的英國，自由黨的政治理念當然與保守黨大異其趣，然此種差異主要表現在內政方面，在外交與帝國政策上，自由主義的立場向來極難有舒展的餘地。換言之，英國自由黨與保守黨的對外政策實質上差別不大，自由黨的外交路線可說是「保守主義式」的；於此，它只能以國家權威與帝國利益為考量，理性寬容與自由民主的觀點不得不收藏。

「新帝國主義」(The New Imperialism, 1871-1914) 時代的開始，正是英國政黨意識型態與現代政黨政治成熟之際，故而在「輝格黨」(Whigs) 演進為自由黨 (Liberals) 時，自由主義在對外問題上便已無表現的舞台，因為此時殖民地的爭奪賽已經熱烈地展開。在一八七〇年代前，由於帝國主義活動沈寂多時，自由黨人在對外政策上尚有高談自由主義的環境，但在列強海外競爭轉趨激烈後，自由黨人也不得不顧念大英帝國祖業，開始講求「武功」。不過，作為向主擁護帝國權益的保守黨之反對者，自由黨一開始也必須「為反對而反對」而攻擊帝國主義，且抒發其反侵略反暴力的理念。何況十九世紀後期的自由黨領袖正是理想色彩極高的格蘭斯敦 (William E. Gladstone, 1809-1898)，他所引導的對外政策，雖不是拋棄帝國權利，但對英國勢力的擴張甚為保守節制，在相對於保守黨的積極進取作風下，自由黨常給與國內外人民一種反帝國主義的印象；這種情形一直持續至一八九〇年代初，對於自由黨在大選時與推動對外政策上，造成甚多困擾。自由黨在

對外問題上所需面臨的道德困境，自然是在其執政時特為嚴重；尤其列強挑戰日甚，為維護英國在帝國競爭上的優勢，自由黨的對外政策在說法（未必是理論思想）與作法上終須改弦易轍。這個改變在格蘭斯敦權勢漸消，而主流派代表羅斯柏理 (5th Earl of Rosebery, Archibald Philip Primrose, 1847-1929) 成為自由黨新領袖的過程中，開始清楚而完整地呈現。本文即是藉著討論羅斯柏理擔任外交部長時期英國對埃及政策的發展，說明自由黨由反帝國主義形象轉為帝國權益擁護者的變化脈絡及其意義。

一八九二年艾伯斯 (Abbas Hilmi II, 1874-1944) 繼任埃及總督 (Khedive, 1892-1914)。艾伯斯是一個涉世未深而有主見的青年，他對英國佔領埃及的威權甚感不滿，而在獲得法國的支持下，企圖擺脫英國對埃及的控制。其具體作法即是反抗英國駐埃總管 (British agent and consul general) 克魯摩 (1st Earl of Cromer, Evelyn Baring, 1841-1917, 在 1883-1907 年間為埃及實際的統治者) 的領導與監督。這導致英埃之間緊張的關係，其中最嚴重的危機即是發生在一八九三年與一八九四年的埃及首相人選爭端與邊境駐兵視察衝突。經過這兩次對立事件，英國自由黨政府著手強化其對埃及的統治權與軍事控制，「自由派的帝國主義」(“Liberal Imperialism”) 由此逐漸成形。這個轉變是克魯摩所說自一八八二年英國佔據埃及以來，英埃「外交」關係史上的第二個轉捩點。<sup>1</sup>

---

<sup>1</sup> Lord Cromer, *Abbas II* (London: Macmillan, 1915), p. 64. 因為此事涉及敏感的政治問題，克魯摩在其論述埃及問題的代表作 *Modern Egypt* (London: Macmillan, 1908) 中，完全未加討論。英國知名的外交官兼政治評論家布朗特 (Wilfrid Scawen Blunt, 1840-1922) 亦指此事為埃及史上的一大轉捩點，但他責斥克魯摩未能藉此推動埃及自治與英軍的撤離，反而進一步加強英國對埃及的控制。請參考 W. S. Blunt, *My Diaries, Part I* (London: Martin Secker, 1919), p. 62, 以及 Public Record Office (PRO), Cab37/33/11, “Mr. Wilfrid Blunt’s Memorandum on the Situation in Egypt,” 22 January 1893 (Printed for the use of the Cabinet, 4 February 1893). 關於何以克魯摩會於此時極力推動永久佔領埃及的政策，其政治背景與心理因素的

## 壹、緣起

一八九二年英國舉行大選，保守黨與自由黨的競選宣傳與論辯皆集中於內政事務與愛爾蘭自治的問題上，只有自由黨黨魁格蘭斯敦及其忠誠的支持者莫利 (John Morley, 1838-1923) 在對外問題上論及英國佔領埃及的不當。就整個大選的論調而言，這也不過是點綴式的政見，但埃及與關注埃及問題最深的法國，對此則大作文章，認真評析；尤其是埃及方面甚至推想，若自由黨勝選主政，英國可能開始自埃及撤軍。這個情形看在克魯摩眼裡，甚是苦惱。<sup>2</sup> 事實上，自一八八二年英國佔領埃及以來，主張英國應主動自埃及撤軍的人，僅限於少數理想派的自由主義者。<sup>3</sup> 一八九二年大選，自由黨獲勝，格蘭斯敦再次組閣當政，然而英軍撤出埃及的想法不僅無法實現，甚至在「民意」的驅使下，他被迫任命堅持強硬帝國政策的羅斯柏理為外交部長，以致英國對埃及的控制反更加嚴厲。

格蘭斯敦雖位居一黨之尊，但他溫和的對外政策路線本來就不為保守黨與大部分自由黨人所認同，使其威望受到相當的影響；另一方面，羅斯柏理在一八九二年自由黨執政之前已蓄積極高的聲望，可與黨魁媲美，使格蘭斯敦組閣時不能不重用之。然

---

探討可參閱 W. M. Welcher, Jr., *No Country for a Gentleman: British Rule in Egypt, 1883-1907* (New York: Greenwood, 1988), pp. 13-14. 至於克魯摩所說的第一個轉捩點是一八八七年沃夫使團 (the Wolff Missions) 失敗所造成的英國長久據埃形勢的確立。關於這個問題可參見王世宗, "Lord Salisbury and the Justification of the British Position in Egypt", 《歐美研究》26: 4 (1996年12月), 頁154-161。

<sup>2</sup> Lord Cromer, *Abbas II*, pp. 12-13; and R. L. Tignor, *Modernization and British Colonial Rule in Egypt, 1882-1914*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6), p. 162.

<sup>3</sup> 此派在自由黨新政府中最重要的人物即是格蘭斯敦 (首相)、哈考特 (Sir William Harcourt, 財政部長) 與愛爾蘭事務部部長莫利 (the Chief Secretary for Ireland)。

羅斯柏理的對外政策觀點與格蘭斯敦幾為南轅北轍，使其有道不同不相為謀之慨。但民間與自由黨人皆期待羅斯柏理將有大用，而依當時的「政治倫理」，首相之下的第一重臣自非外交部長莫屬，羅斯柏理乃成為此職位的當然人選。羅斯柏理不喜受命於一個理想主義者首長，從事其對外開拓與爭取權益的戰鬥，然面對外交部長一職，羅斯柏理又有捍衛大英帝國基業的當仁不讓使命感；格蘭斯敦痛恨冒進黷武的帝國主義行為，但又不得不順應輿論，起用一個強硬派的外交大員。政治中的現實與無奈於此更顯詭趣。這種尷尬矛盾的情狀，在當時倫敦政圈中無人不曉。

早在一八八五年時，羅斯柏理即被人說是一個「自由派的帝國主義者」(liberal imperialist)，而他不以為忤，反稱此說極為恰當貼切，並公開自詡是一個熱中於光耀大英帝國功業的自由黨人。<sup>4</sup>為免來日執行政務時的衝突，羅斯柏理在接受外交部長一職前，特別向格蘭斯敦要求尊重其決策獨立的權力，而格蘭斯敦也同意。<sup>5</sup>這個君子協定絕不是禮貌性的表示，而且是意有所指的——針對埃及問題。因為「東方問題」(the Eastern Question)是當時外交事務的爭議焦點，而自由黨人對其中的巴爾幹問題(尤其是保加利亞問題，格蘭斯敦對此曾發表論文深入檢討)雖有不同看法，但妥協不難；惟有關埃及問題觀點二分，對立嚴重，勢必成為黨內衝突所在，羅斯柏理對此立場堅定，不願對格蘭斯敦讓步，故不能不事先聲明。也就是說，堅持英國佔領埃及的政策是羅斯柏理出任外

---

<sup>4</sup> A Speech by Lord Rosebery in the Tudor Street Hall, Sheffield, 20 October 1885. See (authorship unknown) *The Foreign Policy of Lord Rosebery: Two Chapters in Recent Politics 1886 and 1892-5* (London: Arthur L. Humphrey, 1901), "Appendix," p. 75.

<sup>5</sup> 此為二人秘密協議，見 Lord Crewe, *Lord Rosebery* (London: John Murray, 1931), vol. II, p. 400. Also cf. E. T. Raymond, *The Man of Promise: Lord Rosebery* (London: T. Fisher Unwin, 1923), p. 121.

相所秉持的意志，若不能貫徹這個任務，則就任此職只有自取其辱。這個堅持在他的口中只是「維護外交政策的延續性」。<sup>6</sup>

在獲得格蘭斯敦讓他放手去做的承諾後，羅斯柏理於一八九二年八月十八日就任，開始在新政府中建立起高度獨立作業的外交部團隊。他首先挑選一位與他理念相近的年輕黨員葛雷 (Sir Edward Grey, 1862-1933, 1905-1916 年間任外交部長) 為外交部次長，然後逕自推展政務，不甚在意外界批評，尤其在埃及問題上堅持立場，與政府其他首長意見時有相左。不過，在內閣會議中羅斯柏理雖常不受閣員們普遍的支持，但一八九二年時自由黨關注的政務，正是大選時所訴求的內政與愛爾蘭問題，外交政策多聽從羅斯柏理的決定，他人的反對意見尚不致翻案。因此，在一八九三年艾伯斯事件出現之前，羅斯柏理的埃及政策仍能順利推行而不引人側目，當然何謂自由派的帝國主義，也非外人一時可鑒察。

一八九二年艾伯斯即位後，埃及反英的情緒更甚於前時，部分原因是人們有感於這個年輕的新總督(年方十八)在克魯摩的威嚇下，難以推動新政，只能委曲求全。<sup>7</sup> 在克魯摩而言，這個困境卻是因為昔日英埃統治者之間良好的默契與諒解，被這個血氣方剛的新總督所破壞，以致政務難以順利運作。<sup>8</sup> 引發雙方對立緊張氣氛與激起埃及民族主義情緒的重要因素是，英國在埃及的殖民官米楠 (Alfred Milner, 1854-1925) 在此時所出版的《英國人在埃及》

---

<sup>6</sup> 在一次公開演講中羅斯柏理說：「有一件事我希望在我身後世人仍能記得，那就是我在任職外交部長以來，努力貫徹英國外交政策的持續性。」See *The Foreign Policy of Lord Rosebery*, pp. 28 & 74.

<sup>7</sup> W. S. Blunt to Loulou Harcourt, 26 December 1892. Quoted in W. S. Blunt, *My Diaries*, Part I, pp. 85-86.

<sup>8</sup> Lord Cromer, *Abbas II*, p. 8.

(*England in Egypt*, 1892)一書。<sup>9</sup> 該書一出即引起廣泛的注意，大為流行。它頌揚克魯摩治埃的成功，強調英國對埃及的貢獻，並主張英國對埃及進一步的治理。但在埃及看來(該書在一八九二年時即有阿拉伯文譯本)，它正說明英國將埃及佔為保護地的殖民心態，令當地人民深惡痛絕。如前文所言，埃及人在格蘭斯敦上台主政後，相信英國政府有意及早自埃及撤軍，因此更積極圖求解脫英國的控制，而這個希望立即寄託在同年即位的艾伯斯。在這個時刻，米楠的書對於埃及要求獨立的激情，顯然只有火上添油。但在羅斯柏理就任外交部長並堅決支持克魯摩高壓政策的情形下，埃及人民的目標其實渺不可期。克魯摩說：「東方人若以其對英國政黨政治情勢的觀察，作為其政治判斷的依據，這是極其危險的。」<sup>10</sup> 此言清楚表明他自己堅定的立場，和自由黨政府對帝國利益一樣的重視。

艾伯斯的父親即前任埃及總督杜霏克 (Tewfik Pasha, 1852-1892)在位時(1879-1892)，對於英國大都言聽計從，但艾伯斯的態度則大不相同。在他上台前，有關他即將一改乃父作風而有所為的傳言，早已在開羅流佈。然而在艾伯斯即位後數月間，他與克魯摩的關係仍維持「友善」。克魯摩在一八九二年二月致函英國首相莎士保理 (Lord Salisbury) 時尚稱：「我看這個年輕的總督雖然很想表現埃及人的風格，但他的目標主要是在反對土耳其

<sup>9</sup> 米楠 (Sir Alfred Milner) 曾任埃及財政部次長(1890-92)。其書 *England in Egypt* (London: Edward Arnold, 1892) 的第八章名為「準保護地」(“The Veiled Protectorate”)，直指埃及為大英帝國的轄區；該章首句為：“Such was the nature of the task we undertook”(p. 29)。米楠撰寫此書僅八月，即因調職返英，而倉促出版。作者自言所以不顧文稿的缺失而逕行付印，乃因它「在時下有其價值與意義」(Preface, v)。有關該書對埃及民心政局的影響，可參考 Peter Mansfield, *The British in Egypt*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71), p. 154; and John Marlowe, *Cromer in Egypt* (London: Elek, 1970), p. 176.

<sup>10</sup> Lord Cromer, *Abbas II*, p. 12.

(埃及的宗主國)，而不是反對英國。」<sup>11</sup> 但到一八九二年秋，情勢顯然有了巨變。艾伯斯的自主行為開始引起英國在埃官員向上級反映政務推行的困難。不過克魯摩尚不以為意，他對屬下的報告反應並不積極，使官員們頗有怨言。在十一月時，克魯摩又寫信給當時已在野的保守黨黨魁莎士保理說：「這個總督有些事實糊塗，但他還年輕，缺乏經驗，現在就論斷他的為政方式，尚嫌太早。我已經以坦白不客氣的話教誨過他，我相信目前他還不致於給我惹什麼麻煩。」<sup>12</sup> 論者認為這是克魯摩識見不足，未能防患於未然，以致發生隨後的政治危機。但在克魯摩退職後追記此事的《艾伯斯二世》(*Abbas II*)一書中，克魯摩力言他不是忽視了部屬的警告或艾伯斯謀反的跡象，他採取的是「刻意寬容的態度」(“an attitude of studied moderation”)，以便藉著對小事的讓步，誘使艾伯斯以為英國怯懦無能，而敢於得寸進尺，最後因魯莽而引發大難，屆時英國便有十足的理由與輿論的支持，徹底清算這個好事的總督，永絕後患。<sup>13</sup> 的確，在一八九三年一月九日克魯摩給羅斯柏理的信中，克魯摩明言艾伯斯必然生事，但他強調靜觀其變的必要；他認為讓艾伯斯倒行逆施的行為發展至引火焚身的地步時，英國再採取斷然處置的措施，才是上策。<sup>14</sup> 由此可見，前引《艾伯斯二世》一書所言，也非事後飾過之詞。克魯摩這招正可謂「請君入甕」。若其情不虛，則一八九三年的英埃衝突可說是克魯摩的政治陰謀，它顯示帝國主義者的陰險與霸氣；即便實情並非如此，克魯摩的矯飾也透露他領埃時專橫自用的作風。<sup>15</sup>

<sup>11</sup> PRO, FO633/6, Cromer to Salisbury, 21 February 1892.

<sup>12</sup> PRO, FO633/6, Cromer to Salisbury, 12 November 1892.

<sup>13</sup> Lord Cromer, *Abbas II*, p. 18.

<sup>14</sup> PRO, FO78/4513, Cromer to Rosebery, 9 January 1893.

<sup>15</sup> 克魯摩本名是 Baring，時人戲稱他為“Overbearing”(專橫)。克魯摩任事專橫的傳聞甚廣，許多人批評他對艾伯斯極為無禮而嚴厲，他曾為此特別寫信給羅斯柏理



不論何者，這都表示艾伯斯與克魯摩的抗爭，是一齣帝國主義中權與力惡鬥的戲曲。

一八九二年十二月底，由於埃及首相莫斯塔夫 (Mustapha Fehmi Pasha) 病重，艾伯斯開始考慮挑選新首相，英國同時表示關切，並與艾伯斯「交換意見」。克魯摩屬意親英的里雅斯 (Riaz Pasha)，他相信艾伯斯體會此意，且將服從指示。<sup>16</sup> 事實上，艾伯斯對於在職的埃及政府首長人選早有不滿，此亦為開羅政界所悉，但克魯摩仍不相信艾伯斯敢於忤逆英國的意思，任用「私人」。出人意表的是，莫斯塔夫並未病逝，反而逐漸康復，閣員的變動至此似已無必要。但在一八九三年一月十五日艾伯斯突然下令將莫斯塔夫解職，同時罷黜財政部長與司法部長；他改以反英色彩明顯的法克利 (Fakhri Pasha) 為首相，<sup>17</sup> 財政部長與司法部長也由埃及本土派政治領袖 (Boutros Pasha 與 Mazloum Pasha) 出任。<sup>18</sup> 艾伯斯並暗示，此後他將以自己的看法行使他任命政府官員的權力。這個行動立即被解為反英的壯舉，受到埃及民間普遍的喝采。克魯摩面對這個情況，堅不承認新政府，並對艾伯斯提出嚴厲抗議，施加壓力，造成喧騰一時的「閣員危機」(Ministerial Crisis) 或俗稱的「艾伯斯政潮」(Abbas' Coup)。

---

為自己辯護，見 PRO, Cab37/33/20, Cromer to Rosebery, 23 January 1893.

<sup>16</sup>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1893-94, vol. CXI, Cromer to Rosebery, 29 December 1892, p. 1107.* 克魯摩致函羅斯柏理說，如果英國政府能出文明示，艾伯斯必不敢違抗。對此，羅斯柏理亦表同意。見 PRO, FO78/4517B/2, Cromer to Rosebery, 1 January 1893; and FO78/4517A/1, Rosebery to Cromer, 1 January 1893.

<sup>17</sup> 法克利是土耳其人，他兩年前在司法部長任內，因為堅決反對英國在埃及的改革政策，被克魯摩點名批判，而遭免職。

<sup>18</sup> 此時埃及中央政府共分為七個部門：外交部、財政部、司法部、國防部、公共工程部、教育部與內政部。

## 貳、艾伯斯政潮與英國對埃控制力的強化

艾伯斯在任命法克利之前，本有意以緹格蘭(Tigrane Pasha)為相，並曾商請克魯摩勸說英國政府同意此案。克魯摩表示無法支持此想，但也表示不會出面干預此項任命。他此時十分確定艾伯斯將舉用緹格蘭，但他仍按兵不動，未積極介入以阻止此事。<sup>19</sup> 然而同時他又向羅斯柏理力陳緹格蘭為相之不當，並強調艾伯斯所以敢於妄動，乃因其以為自由黨政府將不如保守黨執政時支持他在埃及的工作。顯然克魯摩是企圖贏取羅斯柏理對他全力的支持，之後才以大刀闊斧的方式解決此事。而就艾伯斯而言，進用緹格蘭的提議只是一種放風聲的試探，其目的正如克魯摩所理解，乃在宣示其主政的權力與獨立性，<sup>20</sup> 人選為何尚是次要的問題。這正是雙方對抗的關鍵：在英國佔領埃及的局面下，埃及總督是否具有獨立自主的統治權？

克魯摩在訴求羅斯柏理的支持時，特別引用一八八四年一月四日自由黨政府外交部長格蘭凡爾(Lord Granville)給他的訓令；該文要求在英國佔領期間，有關埃及政治安定與國家安全的重要問題，埃及總督必須聽從英國所給的建議。<sup>21</sup> 這個訓令其實只是一個原則性的指示，它並未詳述具體的作法及細節；它是英國外交部單方面的立場，而非英國與土耳其的協議，也不是英埃之間的約定。嚴格說來，它只是格蘭凡爾個人的政策訓示，不是英國政府一貫的政策準則。無論如何，此文並不能成為法源，也沒有

<sup>19</sup> PRO, FO407/119/4, Cromer to Rosebery, 2 January 1893.

<sup>20</sup> PRO, FO78/4517B/6, Cromer to Rosebery, 3 January 1893; and FO78/4513, same to same, 9 January 1893.

<sup>21</sup> *British and Foreign State Papers, 1883-1884*, vol. LXXXV, Granville to Baring, 4 January 1884. See also PRO, FO407/121/25, Appendix no. 1. 該文強調英國的埃及政策必須貫徹，所有不聽命從事的埃及官員，均將革職。

約束力或永恆性，克魯摩引用此文只因他甚為認同文中所示的立場，他要強調的是自由黨傳統中也有與保守黨一樣堅定的帝國政策，且應堅持不改。也就是說克魯摩主張對埃及政府嚴格的控制，其真正的訴求不是合法性的問題，而是掌握統治權的英國人應當共同體認的情和理，這個情和理一言以蔽之就是帝國主義的無形力量——「威嚴」(prestige)。另外，克魯摩之所以高聲疾呼此訓令的重要性，也因為它明白表示英國政府將全力支持他執行一切與此相關的政策。換言之，此訓令昭告世人，英國派駐開羅的總管就是埃及最高的統治者。但克魯摩也承認，自一八八二年英國佔領埃及以來，埃及的順服與英國在埃政策之得以推動，純屬「人治」(“artificial system”)的成功，而不是因為英國據埃法權的正當性或制度規範的妥當。他向羅斯柏理指出，若埃及總督不順從英國指示行事，雙方衝突一爆發，英國佔領埃及的合法性問題將隨即成為各方爭議的焦點，使英國再度陷入外交窘境。<sup>22</sup> 克魯摩擔心的事，以及艾伯斯所欲挑起的問題，其實正是「埃及問題」全面與根本的檢討。

在艾伯斯發動「政變」(*coup d'état*，克魯摩用語)前，克魯摩曾向羅斯柏理建議，若艾伯斯反英行為明確，最好的處置辦法即是撤換埃及總督，或者英國政府也可先行作此暗示，以阻止艾伯斯蠢動。<sup>23</sup> 一八九三年一月十一日，克魯摩與艾伯斯會晤，嚴詞警告埃及政府若不依從英國指示施政，後果將不堪設想。但艾伯斯不為所動，甚至暗示英國愈不容他任命緹格蘭，他的決心就愈加堅定。<sup>24</sup> 一月十五日上午，埃及總督派遣其私人秘書往告克魯摩政府行政首長的撤換已經決定。克魯摩要求在他向英國政府通

---

<sup>22</sup> PRO, FO78/4513, Cromer to Rosebery, 9 January 1893.

<sup>23</sup> *Ibid.*

<sup>24</sup> PRO, FO78/4513, Cromer to Rosebery, 12 January 1893.

報此事前，暫不發佈此項命令，總督表示同意。同日，克魯摩即致函羅斯柏理報告此事，並請其堅持格蘭凡爾對埃及問題所樹立的強硬作風；克魯摩主張趁此機會好好教訓這個輕狂的新總督，迫使他公開稱臣，永絕後患。克魯摩力言此時抱持息事寧人的妥協態度最屬非策，因為艾伯斯此舉若得逞，下一步他就將剷除其政府中所有的英籍官員。同時他又再次強調艾伯斯敢於冒進，乃因他認為英國自由黨政府將不如昔日保守黨政府那樣支持駐埃代表。於是，克魯摩進一步要求羅斯柏理授與全權，讓他自由採行任何政策解決這個危機；他甚至請羅斯柏理特別修書一封，讓他示與艾伯斯證明自己獲得英國政府全力的支持，以嚇阻艾伯斯的妄動。<sup>25</sup>

次日，格蘭斯敦政府召開內閣會議討論此事，其決議尚稱溫和與節制。會後羅斯柏理回電與克魯摩，表示英國政府不同意埃及政府的人事調動案。羅斯柏理授命克魯摩轉達此意與埃及總督，但亦要求克魯摩未經倫敦政府同意不得採取進一步的行動。<sup>26</sup> 克魯摩隨即回函力陳強硬對策的必要，他建議「不計任何代價」逼迫艾伯斯歸順；其具體主張是如果艾伯斯不讓步，英軍應立即進駐埃及財政部、司法部及內政部，阻擋新任官員的進入，並進佔埃及電報局，斷其通信。<sup>27</sup> 同時，克魯摩在其私人記載中抱怨格蘭斯敦政府的怯懦無能，他認為若英埃在此事交涉太久，英國政

---

<sup>25</sup> PRO, FO78/4517B/19, Cromer to Rosebery, 15 January 1893; also cf. FO141/299, same to same, 15 January 1893.

<sup>26</sup> PRO, FO407/119/11, Rosebery to Cromer, 16 January 1893; also cf. British Library (BL), Add. MSS. 44290, Gladstone Papers, vol. CCV, Rosebery to Gladstone, 16 January 1893; and Lord Cromer, *Abbas II*, p. 24.

<sup>27</sup> BL, Add. MSS. 44906, Cromer to Rosebery, 16 January 1893; also cf. PRO, FO141/299, Cromer to Rosebery, 16 January 1893; and FO78/4517B/20, same to same, 16 January 1893.

府的弱點將暴露無遺，使英國在埃及的地位陷入危境。這一切的困難克魯摩將它歸咎於格蘭斯敦的頑固不化。<sup>28</sup> 事實上，格蘭斯敦對此事的態度與大部分英國官員相近，即認為艾伯斯的決策不當，不過對於向艾伯斯施壓的程度應如何，他與眾人自有不同的見解；<sup>29</sup> 在另一方面，羅斯柏理一開始也未必完全同情克魯摩的立場，而內閣成員亦咸以為克魯摩的態度過於激烈。<sup>30</sup> 代表「民意」的《泰晤士報》在十六日針對艾伯斯行動所做的社論，也頗為溫和。<sup>31</sup> 這些情形皆顯示克魯摩的反應確屬極端。當然在比較之下，格蘭斯敦可說同情埃及民族主義；他認為艾伯斯所為乃是長久以來埃及人民掙脫外國控制的努力表現，而且他相信這次是自發性的運動，而非克魯摩所言是受到歐洲列強(法國與俄國)的鼓動與支持。他在十六日去信與羅斯柏理表示反對以武力鎮壓，因為英國「有義務維護埃及本土的政權。」<sup>32</sup>

在接到倫敦保守的回應後，克魯摩對羅斯柏理愈加強調埃及政情的危急，與艾伯斯行動對英國在埃地位的威脅，並請母國政府採取積極對策。十一月七日克魯摩再度會見艾伯斯，嚴詞要求他恢復莫斯塔夫的首相職位，並限期(一日後)答覆，當場埃及總督未置可否。當日，克魯摩又致函羅斯柏理，催促其允許英軍進佔埃及政府部門之請，以迫使艾伯斯就範。同日，羅斯柏理回電說英國政府認為他的建議過於激進，且有違背國際公法之虞，恐將

<sup>28</sup> BL, Add. MSS. 44906, Lord Cromer, *Egypt*, pp. 234 & 236.

<sup>29</sup> Gladstone to Queen Victoria, 16 January 1893, in G. E. Buckle ed., *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 3rd S., vol. II (London: John Murray, 1931), pp. 203-204.

<sup>30</sup> PRO, Cab41/22/26, Gladstone to Queen Victoria, 17 January 1893; and T. B. Miller, "The Egyptian Question and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892-94,"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 XXXII, no. 1 (March 1960), p. 4.

<sup>31</sup> *The Times*, 16 January 1893, "The Egyptian Ministry," p. 5.

<sup>32</sup> Gladstone to Rosebery, 16 January 1893, in H. C. G. Matthew ed., *The Gladstone Diari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0), vol. XIII, p. 181.

引發列強干預；羅斯柏理請克魯摩再次警告艾伯斯及早回頭，但也再次要求克魯摩須依倫敦政府指示行事，不可擅動。此時羅斯柏理仍感事有轉寰餘地，而要克魯摩提議其他「較為實際」(“more practical”)的解決方案。<sup>33</sup> 格蘭斯敦至此也未有如何回應艾伯斯拒不讓步的對策，他仍認為英國與列強針對埃及問題作全面的協商，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之道。<sup>34</sup> 此時羅斯柏理向維多利亞女王報告此事，竟招來一陣謀事不臧的責備；女王抱怨此重大事件政府竟未能儘早通報，且反應消極，有損大英帝國的威名。<sup>35</sup> 她的態度顯然與克魯摩一致，令格蘭斯敦政府頗難消受。

有鑑於其主張的強硬對策未獲母國政府支持，克魯摩乃傾向於迅速解決艾伯斯事件，以免事態擴大。然而就在此刻，艾伯斯因感無力與英國周旋到底，乃在十七日下午派緹格蘭與克魯摩「協商」，而達成「共識」：莫斯塔夫不續任首相(克魯摩宣稱此為維持艾伯斯的尊嚴)，但法克利也不接任首相，且受罷黜(同遭罷黜的尚有艾伯斯的私人秘書 M. Rouiller)，該職位由克魯摩原先屬意的里雅斯出任；艾伯斯所任命的新財政部長與司法部長則獲得克魯摩的認可，保有其位，其餘閣員均照舊。此外，在克魯摩的堅持下，埃及總督同意針對此事發佈一篇文告，內容由克魯摩擬定，強調埃及對英國親善的態度，與埃及總督必服從英國政策指示的承諾。次日，克魯摩與艾伯斯會面，確定上述協議。所謂的艾伯

---

<sup>33</sup> PRO, FO78/4517A/15, Rosebery to Cromer, 17 January 1893; also cf. FO141/299, same to same, 17 January 1893; and Rosebery to Queen Victoria, 17 January 1893, in G. E. Buckle ed., *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 3rd S., vol. II, p. 205.

<sup>34</sup> Gladstone's Draft, 17 January 1893, in H. C. G. Matthew ed., *The Gladstone Diaries*, vol. XIII, p. 182.

<sup>35</sup> Queen Victoria to Rosebery, 18 January 1893, in G. E. Buckle ed., *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 3rd S., vol. II, p. 205.

斯政潮不數日即於此落幕。不過，在埃及官方的新政府就職文告中，對於莫斯塔夫的去職與法克利短暫的執政，均隻字未提。依克魯摩所言，在此危機中雙方皆未獲得決定性的勝利，它的收場乃是一種「妥協」。<sup>36</sup>但這顯然不是各退一步的和解，它是埃及自主要求及民族主義的一大挫敗，與大英帝國威權的再度伸張。在歐洲列強眼中，英國此舉簡直是昭告世人英國有權任命埃及的政府首長。羅斯柏理雖不同意此說，但也不諱言英國在埃及有其特殊的地位。事情演變至此，羅斯柏理支持克魯摩的立場不得不愈加積極，這明白表現在他面對法國抗議時的冷峻態度。<sup>37</sup>

在獲得母國政府的肯定之後，克魯摩進一步向羅斯柏理進言，強調艾伯斯事件使埃及民情激昂，類似的衝突不久後即將再起，而其嚴重程度必勝於此次危機，英國政府當及早準備應變。於此，他又再度提倡以軍隊控制埃及政府的作法，因為他已「想不出比比此法更為溫和的建議」了。<sup>38</sup>同時，英國報紙也開始鼓吹對埃及嚴厲的控制措施。<sup>39</sup>相對於克魯摩囂張的氣焰，格蘭斯敦則表現出哀矜毋喜的悲憫之心。克魯摩在危機過後向羅斯柏理慨言，當初不該同意艾伯斯之請而未將一向順從英國的莫斯塔夫留任；另一方面，格蘭斯敦則在向女王的報告中，強調莫斯塔夫的

<sup>36</sup> Lord Cromer, *Abbas II*, p. 27.

<sup>37</sup> PRO, FO141/296, Rosebery to Dufferin, 17 January 1893; FO141/296, same to same, 18 January 1893; FO343/3, Rosebery to Malet, 18 January 1893; and FO343/3, same to same, 1 February 1893. 德國在此時對英國的示好與支持，使得政論家普遍相信英國與「三國同盟」(The Triple Alliance)的關係將因此更為密切。

<sup>38</sup> PRO, FO407/119/27, Cromer to Rosebery, 18 January 1893.

<sup>39</sup> See *The Times*, 17 January 1893, "The Egyptian Ministry," p. 9; *The Times*, 18 January 1893, "The Egyptian Crisis," p. 9; *The Pall Mall Gazette*, 18 January 1893, "Notes on the Egyptian Ministry," p. 2; *The Pall Mall Gazette*, 23 January 1893, "Critical Situation in Egypt," p. 6. 在一封私人書信中，羅斯柏理對克魯摩說：英國所有報紙都支持你在埃及的行動。見 PRO, FO633/7/120, Rosebery to Cromer, 19 January 1893.

健康情形不佳，已難勝任首相職務，英國同意艾伯斯的要求而不予留任，並無不當之處。<sup>40</sup> 若說羅斯柏理的立場是介於格蘭斯敦與克魯摩之間，那麼他顯然是比較偏向克魯摩一方的；他主張若莫斯塔夫健康許可，應派任他另一個官位，以示世人埃及總督終不能任意辭退親英人士。同時，他對於克魯摩以軍隊佔領埃及政府部門的建議雖不同意，但也不像其他閣員加以全然的否定；他向克魯摩說，這個作法「不應列為第二招，而是第五招。」<sup>41</sup>

在艾伯斯政潮期間，克魯摩明白向羅斯柏理提出其治埃理念與政策，但未能獲得母國政府全盤的支持，頗感失意。故在此事件結束後，克魯摩一再請羅斯柏理明示其對埃政策理念，以便「配合辦理」。在此情形下，羅斯柏理首次直接而全面地說明他對埃及問題的立場。羅斯柏理私下向克魯摩表示，他的埃及政策與政府中其他要員的觀念，多有扞格之處；基於內閣議事的協商原則，他不能在公文書中向克魯摩表達個人大力支持之意，只能傳達政府的決議。整體而言，羅斯柏理對克魯摩的治埃路線是認同的。他這個態度隨著艾伯斯政潮情勢的變化，而日漸明顯與堅決。他在事後向克魯摩說明其處理此案的構想時表示，若艾伯斯始終不聽指揮，英國就不必承認他的政權，屆時英國可以增兵脅迫他降服，或透過土耳其蘇丹(Sultan)加以管束，乃至將其解職。<sup>42</sup> 由於羅斯柏理堅持對克魯摩的支持，內閣中主張自埃撤兵的理想派自由黨員終不能發揮其對外交政策的影響力。也因為克魯摩探知羅斯柏理的帝國理念與其相近，使他在艾伯斯政潮方歇之時，立即大膽提出進一步強化對埃及控制的建議，此即是增兵方案。

---

<sup>40</sup> PRO, FO78/4517B/28, Cromer to Rosebery, 18 January 1893; and Cab41/22/27, Gladstone to Queen Victoria, 18 January 1893.

<sup>41</sup> PRO, FO633/7/120, Rosebery to Cromer, 19 January 1893.

<sup>42</sup> *Ibid.*



一八九三年一月十九日，克魯摩上書羅斯柏理建議擴增英國在埃及的駐軍。他力言在埃英軍兵力不足以保衛英國的權益，應立即增派騎兵與步兵員額，並且在當下向埃及人民宣布此決定，以警告艾伯斯新政府萬勿輕動。<sup>43</sup> 巧妙的是，當此信到達羅斯柏理手中時，他正私下修書與克魯摩，告以他對埃及問題的看法，而他在展開克魯摩這封增兵建議的公函前，自己方才落筆的話竟是「我想以增加駐埃英軍武力去威脅艾伯斯，必能使他的神智清醒過來。」<sup>44</sup> 克魯摩的來函直教羅斯柏理大嘆「英雄所見略同」。因此，克魯摩增兵之議一出，羅斯柏理即表全力支持，雖然他已預見其他閣員與法國政府對此強烈的反對。

格蘭斯敦對於增兵一事自是非常反感，他向戰爭部長說：此舉不僅將引人聯想一八八二年英軍攻擊埃及的軍事行動，甚至是表示英國將進一步控制埃及。<sup>45</sup> 事實上，在幾週前，格蘭斯敦方才與法國駐英大使瓦丁頓(William Henry Waddington, 英裔法籍)私下密商英國自埃及撤軍的問題，而羅斯柏理並未被告知此事。根據財政部長哈考特(Sir William Harcourt)的觀察，一月二十日上午當格蘭斯敦看了羅斯柏理增兵埃及的建議函後，情緒變得甚為激動；他向哈考特說羅斯柏理提出這個建議簡直是「拿著槍指著我的頭——要我增派軍隊赴埃，就像要我放一把火把西敏寺燒了，如何了得——我看為今日計，只有教羅斯柏理去職一途。」<sup>46</sup> 當然，這只是首相的氣話，格蘭斯敦政府若無羅斯柏理的支撐，

---

<sup>43</sup> PRO, FO78/4517B/31, Cromer to Rosebery, 19 January 1893; and FO407/119/32, same to same, 19 January 1893.

<sup>44</sup> PRO, FO633/7/120, Rosebery to Cromer, 19 January 1893.

<sup>45</sup> Gladstone to Campbell-Bannerman, 23 January 1893, in G. C. G. Matthew ed., *The Gladstone Diaries*, vol. XIII, pp. 190-191.

<sup>46</sup> D. W. R. Bahlman ed., *The Diary of Sir Edward Walter Hamilton, 1885-1906* (Hull: The University of Hull Press, 1993), 20 January 1893, pp. 186-187.

將難以維持其聲望，此為世人所共識，格蘭斯敦終究不能不讓步，而召開內閣會議認真討論此案。在會前，格蘭斯敦修書向羅斯柏理表示：克魯摩的作為完全未顧及埃及總督的合法權力，解決埃及問題的途徑有二，即武力與國際公約，而內閣成員皆主後者；他同時提醒羅斯柏理，英軍佔領埃及若說是為了剷除當地的惡政，恐怕不能教人心服口服。<sup>47</sup> 首相這番道德勸說顯然作用有限，羅斯柏理當下回信說：現在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是撤出埃及，二是增兵，國際(法國)的抗議不足為患。<sup>48</sup> 在內閣中，羅斯柏理雖居弱勢，但在他以辭職相脅之下，經過多方的協調折衝，內閣最後達成一個順應外交部長要求的妥協，此即是英國政府不在此時宣布增加埃及駐軍，但將籌備此事以應不時之需。<sup>49</sup> 內閣分裂的危機因而暫時化解。當日，羅斯柏理立即轉告克魯摩政府的決議，並要求他不能逕自發佈增兵的消息。<sup>50</sup> 然而羅斯柏理與克魯摩對此結果皆不滿意。

次日，克魯摩數度回電，以激烈的措辭表達他對倫敦政府決議的深度失望；他並再次要求授權，使其可以向埃及政府明確宣布增派英軍的定案——而不是說「有必要的話」英國將增加在埃駐兵。同時他強調埃及群情激憤的程度，已非武力示威不足以鎮壓。<sup>51</sup> 這些說法甚得維多利亞女王的同情，<sup>52</sup> 她向首相表示她對政府保

---

<sup>47</sup> BL, Add. MSS. 44290, Gladstone Papers, vol. CCV, Gladstone to Rosebery, 20 January 1893.

<sup>48</sup> BL, Add. MSS. 44290, Gladstone Papers, vol. CCV, Rosebery to Gladstone, 20 January 1893.

<sup>49</sup> PRO, Cab41/22/28, Gladstone to Queen Victoria, 20 January 1893.

<sup>50</sup> PRO, FO78/4517A/18, Rosebery to Cromer, 20 January 1893.

<sup>51</sup> PRO, FO407/119/40, Cromer to Rosebery, 21 January 1893; also cf. FO78/4517B/36, same to same, 21 January 1893; and FO633/7/390, same to same, 21 January 1893.

<sup>52</sup> Queen Victoria's Journal, 21 January 1893, in G. E. Buckle ed., *The Letters of*

守態度的極度不滿。原來艾伯斯政潮結束時，埃及總督同意嗣後聽從英國指示施政的承諾，事後並未公諸於世，且在埃及報紙的報導中均未提及。<sup>53</sup> 克魯摩堅信此為艾伯斯朝廷刻意誤導的結果，這更強化他採行武嚇政策的決心。他以私函對羅斯柏理說：「你現在的選擇只有向前走，或向後退；換言之，強化英國對埃的控制，或乾脆撤兵。」<sup>54</sup> 羅斯柏理當即回信說：「下週一的內閣會議若不授與你所要求的權力，這外交部長我就不幹了。」克魯摩聞此，亦表示以去職爭之志。<sup>55</sup> 政府中格蘭斯敦等理想派的自由黨人，對於增兵有助於安定埃及當前秩序的說法，尚勉強表示理解；但對於克魯摩等強硬派官員主張出兵是為了威嚇埃及總督的想法，或者為英國在埃及「作長久的打算」，期期以為不可。克魯摩的武嚇方法是向埃及宣告增派英軍的決定，而不作任何的說明，因為他認為宣布增兵的目的是在於維持埃及公共秩序，這個說法對埃及人起不了什麼「政治性作用」。<sup>56</sup> 克魯摩的想法顯然是要埃及人民「不寒而慄」，他不斷強調增兵對英國據埃的「長治久安」之意義。這種長遠的謀慮亦即主張永久佔領埃及，它引

---

*Queen Victoria*, 3rd S., vol. II, p. 209; and Queen Victoria to Gladstone, 21 January 1893, quoted in Philip Guedalla ed., *The Queen and Mr. Gladstone*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1933), vol. II, p. 460.

<sup>53</sup> 據說艾伯斯對旁人說，他對克魯摩的承諾只是願意「諮詢英國代表」，而非「遵從英國的建議」。參見 W. S. Blunt, *My Diaries*, p. 90.

<sup>54</sup> PRO, FO633/7/390, Cromer to Rosebery, 21 January 1893.

<sup>55</sup> PRO, FO633/7/391, Rosebery to Cromer, 21 January 1893. 克魯摩收到此信後回說：「你若不幸離職，我將跟進，屆時埃及的英國官員不是一一辭職，就是全遭罷免，這統治機器瞬間就將瓦解。」See FO633/7/391, Cromer to Rosebery, 22 January 1893. Also cf. BL, Add. MSS. 44906, Lord Cromer, *Egypt*, p. 258. 克魯摩在該文中甚至表示他當時直想逕奔倫敦，在國會中嚴厲譴責格蘭斯敦的埃及政策。

<sup>56</sup> PRO, FO407/119/40D, Cromer to Rosebery, 22 January 1893; also cf. FO141/299, same to same, 22 January 1893.

起自由黨政府極大的反感；內閣中大部分官員只願為控制目前埃及亂象而臨時出兵，雅不欲以未來埃及政策為考慮而增兵。克魯摩的態度與說法使得羅斯柏理在內閣會議中遭受嚴重質疑和批評，但羅斯柏理仍執意支持克魯摩，因為羅斯柏理雖也不同意克魯摩充滿霸氣的作風和表達方式，但在根本的帝國政策理念上卻與之一致。<sup>57</sup> 對羅斯柏理而言，增兵的意義與其說是「救急」，毋寧說是「防患未然」，<sup>58</sup> 他的想法和克魯摩一樣，是要促成英國對埃的永久佔領。

一月二十三日，內閣開會進一步討論埃及問題，決議是立即增加英國在埃駐軍(現約三千人)二營兵力(使英軍數量較前增加一倍)。<sup>59</sup> 至此，羅斯柏理完全勝利，而格蘭斯敦則度過了痛苦的一天。當日，格蘭斯敦及其同志亟欲強調，艾伯斯政潮所造成的緊張情勢雖可謂為「危機」，但這只是暫時的現象，英國不應以長久或進一步控制埃及為著眼點而加派駐兵；若英埃衝突不斷，徹底解決的辦法也不是強化軍事控制，而是透過國際協商重新界定英國在埃及的角色。然而眾人亦知維持自由黨政府的存在乃是首務，否則其他——如愛爾蘭自治、英國民主改革與社會立法——皆成奢談。為此，內閣不得不再度向羅斯柏理讓步。這個現象同時反映自由黨一貫的政治理念，即內政先於外交，英國重於帝國。自由黨在大選前反對帝國主義的聲明，現在已經放棄。當日，羅

---

<sup>57</sup> PRO, FO633/7/392, Rosebery to Cromer, 23 January 1893. 克魯摩在其《艾伯斯二世》一書中也說，艾伯斯事件「若無羅斯柏理的鼎力支持，我也無能為力，所以勝利應歸功於他」(p. 64)。

<sup>58</sup> PRO, FO141/296, Rosebery to Dufferin, 25 January 1893.

<sup>59</sup> 戰爭部長 Mr. H. Campbell-Bannerman 於四月十八日在下議院報告時指出，根據最新統計，英國駐埃軍隊人數為 5,637 人。See *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 4th S., vol. 11, "The British Garrison in Egypt," Mr. H. Campbell-Bannerman, 18 April 1893, p. 1556.

斯柏理便通知克魯摩向埃及政府正式宣告英國即將增加駐埃軍隊的決定，但「不給任何理由」，<sup>60</sup> 完全符合了克魯摩的期望。同時羅斯柏理也訓令英國駐法大使 (Lord Dufferin) 將此事轉告法國政府；羅斯柏理在此特別強調英國所增兵力無幾，也無任何意思改變對埃政策和立場。<sup>61</sup> 此外，英國外交部也在第二天的報紙上刊登增兵埃及的聲明，並解釋所以有此決定是「有鑑於近來的事件危及埃及的公共安全」。<sup>62</sup> 羅斯柏理這些說法均配合一八八二年英國出兵埃及時的聲明，號稱並無政策上的改變，但吾人若考量時間因素，則增兵之舉所具有的政策改變之意義，便呼之欲出。蓋一八八二年英國進軍埃及時，格蘭斯敦政府一再強調這是暫時性的佔領，只要出兵的理由消失，英國必當立即撤出埃及；而如今埃及的情勢即使沒有容許英國撤兵的條件，也未惡化至需要英國增兵以保障其在埃及的支配地位，一八九三年的增兵行動乃是宣示英國「永久」佔領埃及的立場及其控制權的不容挑戰，這個態勢與十年前相較，差別立見。

增兵的消息傳至埃及，首相里雅斯極力安撫人民的激憤，而艾伯斯則未表現任何回應。<sup>63</sup> 土耳其政府(埃及的宗主國)對於英國的行動雖然極為憤慨，但亦無可如何，只能默默忍受。克魯摩力稱增兵之舉成效卓著，埃及人視此莫不懾服安順。在增兵宣告發佈的次日，正巧有英國步兵一營自印度返回英國途中經過蘇伊士運河，該營即被命令登陸行軍通過開羅市區示威，令埃及人民對英國軍力的強大與動員的迅速甚感震驚。據克魯摩說，埃及的反

---

<sup>60</sup> PRO, FO78/4517A/20, Rosebery to Cromer, 23 January 1893.

<sup>61</sup> PRO, FO78/4517A, Rosebery to Dufferin, 23 January 1893.

<sup>62</sup> PRO, FO141/299, Rosebery to Cromer, 23 January 1893.

<sup>63</sup>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1893-94*, vol. CXI, Cromer to Rosebery, 23 January 1893.

英運動因而於一夕間都沈靜了下來，<sup>64</sup> 其得意之情溢於言表。一八九三年二月初，從馬爾它 (Malta) 與直布羅陀 (Gibraltar) 調遣的新增駐軍到達埃及，開羅的激情逐漸消沈，隨後一切復歸「太平」。

### 參、艾伯斯政潮後英國對埃政策的檢討與改變

增兵案引發自由黨政府再度檢討其埃及政策，與英國內部對此事的爭議。一月底至二月初，議會特別藉回應維多利亞女王年度例行談話的發言機會討論埃及問題。在議員的逼問下，格蘭斯敦模糊而牽強地解釋近來英國對埃政策的目的，他說英國政府所為只為二事：一是維護埃及的安全與安定，二是維持英埃政府協調合作的機制。<sup>65</sup> 格蘭斯敦如此的說明只透露其困窘的處境與政府內部對此事的對立，其結果則激發各派議員更多的爭議。艾伯斯政潮過去後，克魯摩、羅斯柏理、乃至歐洲列強，皆認為英埃之間的衝突不久後必再度發生。因此，英國對埃政策的調整或英埃關係的變化，乃成為眾所矚目的課題。一月二十三日《泰晤士報》社論說，輿論皆主張英國政府應全力鞏固在埃及的威權，並確保埃及改革政策的推動。<sup>66</sup> 這個說法自然是為了催促政府採取強硬的埃及政策。同日，內閣會議達成共識，認為政府有必要早

---

<sup>64</sup> Lord Cromer, *Abbas II*, p. 38; and PRO, FO78/4517B/46, Cromer to Rosebery, 26 January 1893. 布朗特則指出此時埃及官員對克魯摩陽奉陰違，人民擁戴艾伯斯政府，反英情緒激昂。見 W. S. Blunt, *My Diaries*, pp. 88-92. 然三月九日，克魯摩向羅斯柏理報告埃及局勢時，力稱國泰民安。見 FO78/4513, Cromer to Rosebery, 9 March 1893.

<sup>65</sup> *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 4th S., vol. 8, "Address in Answer to Her Majesty's Most Gracious Speech," Mr. Gladstone, 3 February 1893, p. 479.

<sup>66</sup> *The Times*, 23 January 1893, "The Situation in Egypt," p. 5.

日公開說明其埃及政策，以釋群疑，並使克魯摩有所依循。<sup>67</sup>稍後，克魯摩也對艾伯斯政潮前因後果的發展，作了完整的報告與檢討，以供英國政府決策時參考。<sup>68</sup>

格蘭斯敦雖承認艾伯斯事件使英埃關係一時變得微妙複雜，但他堅持此事件並未改變英國對埃政策立場，<sup>69</sup>他仍希望英國軍隊早日撤離埃及(四月間格蘭斯敦曾私下草擬兩年內自埃撤兵的方案)，<sup>70</sup>這不僅是基於他的自由主義政治理念，也與他的外交立場有關；他認為自埃撤兵必可改善英法兩國關係，也可徹底解決英土的糾紛，而使英國不必為了自保而與三國同盟 (Triple Alliance) 發展密切的合作關係，捲入更多國際衝突。這也是許多自由黨人的想法。羅斯柏理的態度則是強化英國對埃及的控制，並加強英國與三國同盟的關係，以防埃及與歐洲反英勢力串連。時人多認為艾伯斯敢於對英挑釁，乃因後有法俄二國的慫恿與支持，而英國對此堅不退讓，使一般皆判斷此事將促使英國更拉近其與三國同盟的距離。這也是英國民眾較為歡迎的路線。格蘭斯敦的立場使其強調艾伯斯之舉乃出於自主，而埃及的騷動為民族主義情緒的表現，英國不應有過度的反應。這種態度不是英國大眾所能接受的。埃及在此間的動盪使得英國民間幾乎一致擁護羅斯柏理強勢的作為，倫敦政界反帝國擴張的聲音大為消沈。

相對於格蘭斯敦強調英國對埃政策無庸更改，羅斯柏理在艾伯斯政潮後堅定認為英國必須改變其埃及政策。如前文所言，他的行動已將英國在埃及的控制權恆久化，並提升至統治者的地步。他私下對克魯摩說：「面對埃及這樣充滿敵意的君主、士兵與

---

<sup>67</sup> PRO, Cab41/22/29, Gladstone to Queen Victoria, 23 January 1893.

<sup>68</sup> See PRO, FO407/119/102, Cromer to Rosebery, 25 January 1893.

<sup>69</sup> H. C. G. Matthew ed., *The Gladstone Diaries*, vol. XIII, 18 April 1893, p. 227.

<sup>70</sup> H. C. G. Matthew ed., *The Gladstone Diaries*, vol. XIII, 20 April 1893, p. 228.

人民，我們不必再自欺說英國佔領埃及的角色與政策並無改變。」<sup>71</sup>此與前述英國政府對外宣稱其埃及政策未因增兵而改的說法，大相逕庭。反對黨在下議院的領袖包福爾 (A. J. Balfour) 一月底在議會中便指出，即使英國政府對埃及政策未改，但英國在埃及的立場和處境，顯然因為此次危機的教訓而大有變化。<sup>72</sup> 包氏的意思也在呼籲政府面對埃及問題改變的事實，並採行強硬的政策。羅斯柏理在二月一日給英國駐土耳其大使 (Sir Clare Ford) 的公函中，其實已暗示英國對埃政策的轉變。他說：「英國政府的(埃及)政策並沒有改變，不過此後我們將採取一切有效的方法去貫徹這項政策。」<sup>73</sup> 這個目的不改而手段活用的說法，已經表現不同的政策取向，因為英國所宣傳的埃及政策原則，本來就極為含糊籠統，對於實際的措施規範作用不大，而且目的與手段在現實的政治中也不可能清楚區隔。更諷刺的是，一八八二年當英軍進佔埃及時，英國政府對列強宣稱其目的是在捍衛埃及總督任免其政府首長的合法權力；如今英國一切增兵恫嚇之舉，竟是因為不滿埃及總督任免其政府官員。今是昨非，英國的埃及政策若說仍無改變，只能招致掩耳盜鈴之譏。無怪乎一八九三年一月十八日時，法國政府抗議英國在艾伯斯政潮中的作為，即直指它是兼併埃及的舉動。<sup>74</sup>

格蘭斯敦在五月間議會質詢答辯中，也無奈而含蓄地表示一月中所發生的事件，使他的撤兵構想無從實現。自一八八二年英國佔領埃及以來，由於當地統治者對英國的順服，使英國凡事可

---

<sup>71</sup> PRO, FO633/7/122, Rosebery to Cromer, 27 January 1893.

<sup>72</sup> *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 4th S., vol. 8, "Address in Answer to Her Majesty's Most Gracious Speech," Mr. A. J. Balfour, 31 January 1893, pp. 92-93.

<sup>73</sup> PRO, FO407/119/78, Rosebery to Clare Ford, 1 February 1893.

<sup>74</sup> PRO, FO407/119/30, Rosebery to Dufferin, 18 January 1893.



於幕後發號施令，而不必公開控管埃及，因此英國政府無須正式或完整地宣布及定義其在埃及的政策與地位。如今艾伯斯挑起問題，引發各方對此質疑與注意，迫使英國必須明確交代與釐清她在埃及的角色定位。只此一點便已構成英埃關係的一大變局，因為這是過去十年間英國政府始終未能解決的難題，也是英國帝國政策中的一大弱點。（一八八七年英國為解決此問題而派出特使往君士坦丁堡與土耳其政府協商，終因土耳其皇帝拒絕批准協約而告失敗。此事最多只能使英國將其在埃及地位懸而未定歸咎於土耳其，但仍不能消解英國在埃及名分不明的尷尬處境。）簡言之，艾伯斯政潮揭露而且強化了英國以武力控制埃及的真相及其長久佔領的本意，它迫使自由黨理想派承認其溫和講理的外交與帝國政策，在群眾政治與國際競爭下為不可行。誠如《泰晤士報》社論所言，任何批評格蘭斯敦在此事件中未能履行其理念的言論，均屬「天真可笑」。<sup>75</sup> 儘管事後英國官方仍稱其埃及政策無改，但各國均認為英國政府已藉由行動，對其控埃權力作了一次較以往更深入的宣示，這也是英國有識者早已意料的事。

另一方面，羅斯柏理也認為經過艾伯斯事件，英國必須認真考慮重新展開與土耳其政府協商埃及問題的必要性，因為這是鞏固與合理化英國佔領埃及地位的根本方法。然而此法同時也必將迫使英國減低對埃及政務的干預度，損及英國的權益，非英國人民所樂見。羅斯柏理的帝國主義性格於此便表現在他不同意格蘭斯敦主張徹底自埃撤兵，或前保守黨首相莎士保理以英土國際談判方式解決埃及問題，而是企圖以英德結盟來壯大英國勢力、確保英國據埃地位；與土耳其蘇丹的妥協只是羅斯柏理退而求其次的策略，而非他認為的上策或當務之急。然為杜人口實，他的構

---

<sup>75</sup> *The Times*, 19 January 1893, "The End of the Egyptian Crisis," p. 9.

想是一方面尋求與歐洲其他列強的合作，以強化英國對埃及的控制力，另一方面則進行與土耳其的「溝通」，以合理化英國對埃及的控制權。<sup>76</sup> 一八九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格蘭斯敦在議會中表示願意與法國或土耳其政府重新展開協商，以解決埃及問題。<sup>77</sup> 對此，羅斯柏理評論說，關於埃及問題的解決，英國政府只承認兩件事，一是土耳其為埃及的宗主國，二是列強集體協商的共識才有效力，法國對埃及並無特權，其片面主張並無作用。<sup>78</sup> 所謂承認土耳其宗主權與列強決議，正顯示前文所說羅斯柏理對埃政策的兩方面策略。

自一八八二年德奧義三國同盟成立以來，德國一直企圖拉攏英國使為新盟友。艾伯斯政潮期間，三國對英表現極高的善意，德國甚至勸土耳其默認埃及新局，不必為難英國。同時，法俄也漸漸積極協商結盟的可能。在一八九三年的危機中，法國力勸土耳其呼籲歐洲各國針對埃及問題評理論道。可知歐洲國際社會正瀰漫著一股分陣對峙的氣氛。羅斯柏理親近三國同盟以鞏固英國控埃實力的作法，不僅是掌握時勢的務實政策，也巧妙結合了英國的歐陸外交策略與海外帝國主義行動，同時促進英國的安全與利益，表現十足當下強權政治 (power politics) 的謀略。

然而上述概念下英國對埃政策具體與細部的作法為何，仍有待釐清。一八九三年一月二十八日克魯摩再度以私人信函請羅斯

---

<sup>76</sup> See PRO, FO633/7/122, Rosebery to Cromer, 27 January 1893; and FO407/119/79, Rosebery to Dufferin, 1 February 1893. 格蘭斯敦與羅斯柏理此時對埃及問題看法的歧異，可見於 BL, Add. MSS. 44290, Gladstone Papers, vol. CCV, Gladstone to Rosebery, 4 February 1893.

<sup>77</sup> *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 4th S., vol. 8, "Address in Answer to Her Majesty's Most Gracious Speech," Mr. Gladstone, 31 January 1893, p. 117.

<sup>78</sup> PRO, FO407/121, "Memorandum by Mr. Bertie on the Affairs of Egypt, August 1892-October 1893," 15 October 1893.

柏理明示將來的政策，以便應付下次政治危機。於此，克魯摩明白主張與勸說羅斯柏理大膽採行強勢進取的政策 (forward policy)；他認為英國若決意如此放手做去，就不必再掩人耳目，畏首畏尾，不如直接向法國與埃及總督表明此想。<sup>79</sup> 對此，羅斯柏理大致表示認同，但身為自由黨政府的外交部長，其施政理念又與首相相左，羅斯柏理在推行此類強硬政策時，仍不免有所牽掛。為了推動他的埃及政策，羅斯柏理開始尋求皇室的協助，希望透過女王對格蘭斯敦政府的施壓，減少外交政策的阻礙。一月二十九日羅斯柏理請求女王出面指示格蘭斯敦政府官員，在議會中論及埃及問題時，能有一致的說法。次日，女王即下書與首相，要求其有關埃及的發言必須「堅定而明確」(“firm and unequivocal”)，以免艾伯斯認為英國政府內訌，又趁隙生事。<sup>80</sup> 當日，格蘭斯敦立刻回覆說，此番政府對埃及問題的宣言絕不會再有所退縮。<sup>81</sup> 這又是羅斯柏理帝國主義對抗格蘭斯敦自由主義的一次勝利。事實上，在艾伯斯政潮後，英國對此激昂的民情，極有利於羅斯柏理推動其對埃的強硬政策。他開始刻意以嚴峻的言語，對土耳其駐英大使表示英國對埃及問題的堅定立場，藉此向列強宣傳英國的「新」政策。同時他也贊同埃及政潮落幕以來，克魯摩疏遠艾伯斯而嚴控里雅斯的新手腕。在羅斯柏理的支持下，克魯摩領埃的作風更見跋扈，對埃及的褻瀆成為他的慣用手法。「英土聯合軍事佔領」便是他最厲害的威嚇埃及人的妙計<sup>82</sup> (埃及民族主義運動所欲擺脫者，正是英國與土耳其的控制)。

---

<sup>79</sup> PRO, Cab37/33/20, Cromer to Rosebery, 28 January 1893.

<sup>80</sup> G. E. Buckle ed., *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 3rd S., vol. II, pp. 216-17.

<sup>81</sup> Gladstone to Queen Victoria, 30 January 1893, in Philip Guedalla, *op. cit.*, vol. II, p. 463.

<sup>82</sup> PRO, FO633/7/394, Cromer to Rosebery, 6 February 1893.

羅斯柏理對這個構想雖無法支持，但他也傾向援引土耳其威權來打壓埃及總督勢力的策略。大體上，強硬派英國主政者逐漸意識到，若埃及問題不能如英國所望處理，則不如將它發展成英土問題，亦可達到英國在埃及的目的。由此，羅斯柏理開始考慮與土耳其再次談判的方針，他欲藉此使土耳其皇帝備感尊榮，而默許英國佔領埃及之事。此即是說，羅斯柏理有意重新推動前保守黨政府所進行的英土協商，但絕不處理沃夫使團 (Wolff Missions) 的主要任務——自埃撤軍問題，而且談判內容不詳細計議，也不採用當年已簽署但未獲土皇批准的條約文字。可知羅斯柏理對於透過英土諒解以解決埃及問題，實際上缺乏誠意，只是將其視為一個宰制埃及民心的有效手段。事實上，在艾伯斯政潮發生之前，羅斯柏理就曾表示與土耳其協商英國撤出埃及事宜，「只有浪費時間而已」。<sup>83</sup> 如此，他對這個方案所持的姿態愈來愈高，他私下向克魯摩表示，他對此類談判極不耐煩；但要罷免艾伯斯若無土耳其蘇丹的同意也不可行，故控制埃及仍有賴行之已久的幕後操縱辦法，不能明目張膽為之，待英國取得土耳其公開的認可，即如虎添翼，屆時埃及總督再不可能造次。<sup>84</sup> 而在談判開始之前，羅斯柏理竟也同意克魯摩以放出英土協商的風聲去要脅埃及政府的伎倆。<sup>85</sup> 同時他卻又對英埃協議的達成，表現極低的期望和極高的悲觀。<sup>86</sup> 羅斯柏理的帝國主義氣息在此已充分流露。他認為英國主宰埃及施政方向的理由，毫無可議之處，因為即使不論一八八三年至一八八四年間，格蘭凡爾有關英國在埃立場的

---

<sup>83</sup> BL, Add. MSS. 44290, Gladstone Papers, vol. CCV, Rosebery to Gladstone, 7 November 1892.

<sup>84</sup> PRO, FO633/7/125, Rosebery to Cromer, 14 February 1893; and FO633/7/127, Rosebery to Cromer, 24 February 1893.

<sup>85</sup> PRO, FO633/7/126, Rosebery to Cromer, 17 February 1893.

<sup>86</sup> See PRO, FO407/120/126, Rosebery to Clare Ford, 30 October 1893.

公開聲明(已獲埃及政府的「默認」)，光以「最普通的常識」也可合理化英國在埃及的地位。<sup>87</sup>

威嚇埃及政府的另一手段是公布英國對埃政策檔案，尤其是艾伯斯政潮以來羅斯柏理與克魯摩的公文書信，以使埃及知曉英國主政者的堅定立場。換言之，英國對外向來宣稱的埃及政策與其實際作法相去甚遠，若讓埃及人民瞭解英國政府真正的態度，將使其有所警惕，不敢蠢動。但另一方面，這也可能激起埃及群情譁然，引發另一次民族主義暴動。然自一八九三年初的危機以來，埃及政府與民間反英的事件仍時有所聞，尤其五月、八月與十一月間，埃及政府中曾發生嚴重的英埃官員衝突，幸因總督與首相的節制，而未演成大禍。此種情勢使克魯摩的高壓政策更為堅定。克魯摩在艾伯斯政潮結束後的一、二月間，一再向母國報告英國增兵後的良效——埃及官民的屈服順從，但另一方面，尤其在三月之後，又不斷強調埃及潛在的叛亂勢力與危機再現的可能。不論報喜報憂，他的意思即是主張強化對埃及的軍事控制。克魯摩自言在艾伯斯事件過後，他特意改採寬容安撫的作法，但成效欠佳。<sup>88</sup> 因此他極支持公開英國對埃政策的官方文件，以警告埃及人民不能心存妄想。

但格蘭斯敦政府對此想法並不能接受，克魯摩在埃及的專橫作風更令自由黨人不安。例如知名的自由派政論家布朗特(W. S. Blunt)在艾伯斯政潮以來，不斷為文批評克魯摩治埃的專斷無能，他指出英國對埃及的「軍事佔領」(military occupation)其實不若「文

---

<sup>87</sup> PRO, FO78/4512, Rosebery to Cromer, 16 February 1893. 此信在一月十六日已草成，遲至二月十六日才發出；它完整說明英國政府對艾伯斯政潮的處理態度。該文後來收入國會文件，以周告國人英國對埃立場。見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1893-94*, vol. CXI, p. 1123.

<sup>88</sup> PRO, FO633/7/400, Cromer to Sir P. Currie, 29 March 1893.

官佔領」(“civil occupation”)危害之甚。<sup>89</sup> 保守黨領袖莎士保理對於克魯摩的作為也極不贊同。面對來自兩黨的攻擊、政府內部的矛盾、以及自身處境的困窘，格蘭斯敦在議會中只有請求議員們對於埃及問題不要追根究底地逼問，以免壞事。<sup>90</sup> 一八九三年夏，倫敦政界有調遣克魯摩離埃至印擔任總督的建議。對此，羅斯柏理直接向格蘭斯敦表示反對；他指出艾伯斯政府處心積慮欲迫克魯摩去職，一旦英國政府將他調離，埃及民心必然激盪，使英國立即面臨棄守的困境。<sup>91</sup> 在羅斯柏理的堅持下，此議隨即擱置。至一八九三年底，另有裁減英國在埃駐兵數量的建議，在羅斯柏理與克魯摩的反對下，該案亦不了了之。綜觀一八九三年英國對埃政策，可見格蘭斯敦溫和立場的一次次失利，和羅斯柏理強硬路線的一步步鞏固。

#### 肆、邊境事件與英國領埃威權的再確立

如前言，艾伯斯政潮後，英埃衝突成為開羅與倫敦政治觀察者的預言；克魯摩與羅斯柏理均懷有此憂，但也對它帶有某種期望，因為這將試煉他們在埃及所建構的新統治威權力量，或者他們將可利用英埃再次的衝突，進一步推動永久佔領的政策，將埃及轉化為名正言順的保護地或殖民地。在埃及一方，人民對艾伯斯的擁護與仇英情緒，也在尋求發洩的出口，同時試探英國控制

---

<sup>89</sup> W. S. Blunt, “The Khedive and Lord Cromer,” *The Nineteenth Century*, vol. XXXV, no. CCIV (February 1894), p. 182. 對於布朗特的抨擊，克魯摩亦急於反駁，參見 PRO, FO407/119/157, Cromer to Rosebery; FO407/119/170, same to same, 29 April 1893; and FO633/7/129, Rosebery to Cromer, 21 April 1893.

<sup>90</sup> *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 4th S., vol. 11, “Egyptian Affairs,” Mr. Gladstone, 1 May 1893, pp. 1655-56.

<sup>91</sup> BL, Add. MSS. 44290, Gladstone Papers, vol. CCV, Rosebery to Gladstone, 10 August 1893.

埃及的實力與決心。一八九三年末，埃及政府中英埃官員的衝突又有惡化現象；一八九四年初，此對立氣勢即在艾伯斯視察蘇丹邊防駐軍所引起的「邊境事件」(Frontier Incident)中，爆發衝突。

邊境事件仍與埃及統治權的問題有關。原來駐埃英軍司令齊志南(Horatio H. Kitchner)亟謀南向擴邊，而與上埃及和努比亞(Nubia)地方部落積極結盟，準備舉事。但齊志南的計畫並未向艾伯斯報告，使得這位埃及軍隊名義上的總指揮甚感羞辱與憤怒。總督的近臣趁機進言，請其適時向英方嚴正聲明自己的治埃法權，以報前仇。一八九四年一月，艾伯斯與幾位親信(未包括政府閣員)南下埃及邊境(Assouan)視察，藉以瞭解齊志南密謀發兵的狀況。齊志南對總督的視察處處阻撓與防範，使艾伯斯益感不悅。一月十九日艾伯斯的不滿終於爆發，在檢閱一支埃及部隊後，他對於部隊行進步伐不整的情形，<sup>92</sup> 嚴詞加以斥責，指其紀律與訓練不良(稍前這支軍隊才獲得土耳其官方與英國駐埃軍隊總指揮General Walker的褒揚)，指桑罵槐地批評該軍司令齊志南及英籍軍官謀事不力。隨後，齊志南立刻向艾伯斯提出辭呈(以示抗議)，總督拒絕其請，雙方反感表露無遺。事後齊志南向克魯摩告狀，極言艾伯斯的囂張狂妄。克魯摩因財政因素並不主張此時向蘇丹推進的軍事行動，但基於政治考量，他卻於此時大力支持齊志南對艾伯斯的抗爭，有意將小事化大，以再次打擊埃及總督的威勢，確立自己至尊的地位。克魯摩形容艾伯斯與齊志南的爭執是他等候良久的「絕佳戰局」，因為這是一個令英國大眾激動而歐洲列強無由介入的事件。他指出艾伯斯此次錯誤將使制服總督之事，變得輕而易舉。<sup>93</sup>

<sup>92</sup> 關於此事的細節，各方說法與記載不一。

<sup>93</sup> Lord Cromer, *Abbas II*, pp. 50, 53 & 55. 如同艾伯斯政潮一樣，邊境事件在克魯摩筆下，也是他耐心等待艾伯斯中計的陷阱。據在埃的英國高級軍官所說，大部

一月二十日，克魯摩在接獲齊志南的通知後，立即向羅斯柏理報告此事，請其對埃及政府施壓，逼迫艾伯斯返京，並罷免隨總督南下督軍與獻策的國防部副部長馬赫 (Maher Pasha, 反英大將)；克魯摩同時建議，若艾伯斯不從，則以收編所有埃及部隊於英軍直轄之下，以為威脅迫其就範。<sup>94</sup> 羅斯柏理隨即回信表示支持，並要求埃及總督立即發佈對齊志南及其部隊的褒揚令。<sup>95</sup> 私底下，羅斯柏理另發一函告訴克魯摩，當下英國政府閣員分散各地，內閣會議一時間無法召開來討論此事，但羅斯柏理表示願承擔責任，請克魯摩放心大膽去做；同時羅斯柏理還主動告訴克魯摩可以假借英國外相對此事的憤怒，挾制埃及政府。他對克魯摩說：「你應該嚇嚇他，我給你的電報你可以好好利用。」<sup>96</sup> 由此可見，前述以公開英國對埃政策文件，來脅制埃及人的構想，羅斯柏理原則上也是認同的。至於英軍統轄所有埃及部隊的恐嚇意見，羅斯柏理也表同意。相較一年前艾伯斯政潮期間羅斯柏理給克魯摩的回應，他現在的作風顯然霸道許多。同時，羅斯柏理特意公開近來許多英人在埃受辱的消息，以激發英國大眾仇埃情緒與對政府強硬政策的擁護。一月二十二日，在取得母國政府的支持後，克魯摩立刻與埃及首長會面，嚴詞告以事態的嚴重性，並要求即刻將馬赫調職處分，及表揚蘇丹的駐兵，尤其是英籍軍官。開羅政府在此脅迫下，隨即電告在南疆的總督，但艾伯斯反應冷漠。首相里雅斯見情形不妙，決定親自南下勸說。此時開羅政情激昂，充滿不安之象。同時，倫敦《泰晤士報》社論大力聲援政

---

分的士兵，包括英籍軍官，對於艾伯斯與齊志南之間的衝突，渾然不覺，直到他們閱讀報紙之後，才知曉所謂的邊境事件。參見 R. L. Tignor, *Modernization and British Colonial Rule in Egypt, 1882-1914*, p. 173.

<sup>94</sup> PRO, FO78/4578, Cromer to Rosebery, 20 January 1894.

<sup>95</sup> PRO, FO78/4577/5, Rosebery to Cromer, 21 January 1894.

<sup>96</sup> PRO, FO633/7/410, Rosebery to Cromer, 21 January 1894.



府對此堅定的立場和「溫和」的主張，並對埃及總督毫無保留地批判。<sup>97</sup> 兩國對峙氣氛再次高張。

英國政府之堅持馬赫去職，正如一年前堅拒艾伯斯自主的人事案，其目的在宣示任何不服從英國指揮的埃及官員，均不得安於其位。因此羅斯柏理特別要求克魯摩迅速了結此案，不可拖延，以收殺雞儆猴之效，永絕後患。於此，羅斯柏理甚至表達了罷免艾伯斯的想法；他向土耳其當局強調，艾伯斯此次妄為也侮辱了土耳其政府的威信，暗示撤換埃及總督的必要性。<sup>98</sup> 羅斯柏理在處理此次事件時，未諮詢政府其他首長(無內閣會議)而獨自裁決，利用民意強化外交政策，以力服人而不由分說，這些作法都與自由主義理念不牟，但黨內反對的聲勢卻更不如以往。自由派的帝國主義至此可說已經定型而茁壯。相對於去年，羅斯柏理的埃及政策顯得更為激進、具體、縝密、富有陰謀、而有「一勞永逸」(即永久佔領)的構想。艾伯斯政潮時，克魯摩不斷向羅斯柏理請示政策方針，現在則羅斯柏理主動表示看法和下达指令，他並開始積極邀克魯摩提出構想，共商大計。

一月二十六日，艾伯斯對於英國兩項要求都表示接受。<sup>99</sup> 其對埃及軍隊的褒揚令當日即發佈，<sup>100</sup> 但馬赫調職之事，艾伯斯請待政府部門中其他等級相當的職位出缺時始進行。對此，克魯摩向羅斯柏理建議給一個月的期限，羅斯柏理則認為應令其即刻卸

<sup>97</sup> *The Times*, 25 January 1894, "The Egyptian Army," p. 9; and *ibid.*, 29 January 1894, "England and the Khedive," p. 5.

<sup>98</sup> PRO, FO633/7/133, Rosebery to Cromer, 26 January 1894.

<sup>99</sup> 據布朗特記載，克魯摩除了這兩項要求外，尚有第三項要求是，在埃英籍軍官若違法涉案，有權力要求返回英國接受軍法審判。這點據說艾伯斯也同意了。見 W. S. Blunt, *My Diaries*, Part I, p. 127.

<sup>100</sup> 該文刊於埃及的 *Official Journal*，全文可見於 *The Pall Mall Gazette*, 29 January 1894, "The Khedive and the English," p. 7.

去國防部職務，以免其再趁隙滋事。<sup>101</sup> 在此，羅斯柏理表現前所未見較克魯摩更為高壓的態度。為化解僵局，克魯摩與埃及政府協商，取得未來國防部副部長人選必經英國同意的保證，然後再勸說羅斯柏理就此罷休，<sup>102</sup> 終於獲得首肯，邊境事件至此乃告結束。一月二十七日，倫敦知名的《培湄晚報》(*The Pall Mall Gazette*)於頭版頭條刊出邊境事件的收場消息，它指出此類事件所以發生，乃因一年前艾伯斯政潮中英國未能以鐵腕徹底解決問題所致；它並痛斥埃及總督的作為，同時主張對埃及問題採取強硬(如罷免艾伯斯)與立即解決的辦法，而不應再以妥協方式息事寧人。<sup>103</sup> 同時其他報紙對此事也大幅報導，並用詞嚴厲同聲討伐埃及總督。這類充滿霸氣的論調，在英國報業界至為罕見，較艾伯斯政潮時輿論界的反應，更見激烈。它可說明前述羅斯柏理煽動民情的策略之成功，也說明此時英國人民對羅斯柏理埃及政策的熱情支持。激進人士針對艾伯斯所發表的嘉勉埃及軍隊之文告，表達不滿，認為其誠意不足，顯示艾伯斯仍包藏禍心；他們要求政府以更強硬的手段解決埃及問題，使得羅斯柏理所為反見溫和節制。《泰晤士報》更稱，各方咸認為政府對此事所持的寬容態度，表現了泱泱大國的風範。<sup>104</sup> 然事實上，在英國的威嚇下，埃及總督完全屈服，不數日即將馬赫改調為文職(薩伊港 Port Said 總理事)，其遺缺則由齊志南所推薦的人選(Sir E. H. Zohrab Pasha，出身 Armenia 的基督徒)繼任。

此後英埃關係雖仍敵對，然艾伯斯及其政府對英國的威權再

---

<sup>101</sup> PRO, FO78/4577/9, Rosebery to Cromer, 26 January 1894.

<sup>102</sup> PRO, FO78/4578, Cromer to Rosebery, 27 January 1894; also cf. FO633/7/413, Cromer to Rosebery, 26 January 1894.

<sup>103</sup> *The Pall Mall Gazette*, 27 January 1894, "The Heart of Pharaoh," p. 1.

<sup>104</sup> *The Times*, 30 January 1894, "Egypt," p. 5.

不敢公然忤逆，埃及反英的民族主義氣勢也大不如前。一般認為，艾伯斯在去年與英國的對抗，使其在埃及民間的聲望大為提高，但邊境事件則使其影響力大減。實際上，這次衝突所以迅速落幕，與埃及首相里雅斯的態度關係甚大，因為艾伯斯離開首都南下發動對英國威權的再次挑戰時，本期待開羅政府會有同仇敵愾的響應，不意里雅斯等人反即時向克魯摩輸誠，令艾伯斯深感孤立無援，而不得不降服（這正證明艾伯斯政潮的結果是英國的勝利）。為此，艾伯斯與里雅斯政府的關係轉趨惡化與疏離。克魯摩在坐收漁翁之利時，同時企圖藉此次事件逼迫埃及總督與政府官員在其他英埃爭議問題上，做原則性的讓步，且獲得不錯的成效。<sup>105</sup> 邊境事件後，在論及埃及情勢的書信中，克魯摩展現了極高的自信與樂觀，這與他在年前艾伯斯政潮後的憂慮與悲觀預期，形成強烈的對比。前述克魯摩勸說羅斯柏理讓邊境事件儘早收場的「寬容」表現，正反映了他對埃及政局完全掌控的信心。

邊境事件中里雅斯政府的媚英表現，使其在民間的威望與支持度遽降，埃及政情又變得浮動。克魯摩對此則冷眼旁觀，他自信滿滿地說，只要他一句話，可教埃及政府改組；只要他保持緘默，變局便無由得起，因為艾伯斯已無勇氣再扮演鬥士了。<sup>106</sup> 四月十四日，在不得各方支持的窘境下，里雅斯辭去首相職務，艾伯斯主動向克魯摩徵詢繼任人選。克魯摩提名努巴爾 (Nubar Pasha)，並建議其他閣員名單，對此，艾伯斯完全聽從，毫無一年前的氣概。六月時，艾伯斯往訪君士坦丁堡，拜見土耳其皇帝，請

<sup>105</sup> PRO, FO78/4574, Cromer to Rosebery, 25 February 1894.

<sup>106</sup> PRO, FO633/7/417, Cromer to Kimberley, 4 March 1894; also cf. FO78/4574, Cromer to Rosebery, 4 March 1894. 克魯摩對於里雅斯也不具好感，因為他相信里雅斯等人在邊境事件之前，曾鼓動艾伯斯採取反英的行動，事後則因不敢承擔後果而背棄總督。見 Lord Cromer, *Abbas II*, p. 60.

求協助埃及脫離英國的控制。由於此時埃及與土耳其對英國均已不成憂患，克魯摩與羅斯柏理對此皆不甚措意，足見英埃關係已極為「穩固而確定」。對英國而言，現在她已不需藉埃及籠絡土耳其，也無庸引土耳其宰制埃及。<sup>107</sup> 這表示埃及問題所涉，漸少英國與土耳其的關係，而漸多英國與歐洲列強的關係。一八九三年以來，法國幾度抗議英國強化對埃控制無效後，也逐漸接受英國在埃及的獨霸地位。一八九八年法國在法紹達危機 (Fashoda Crisis) 中的讓步，並不是考量一時的劣勢與困境而已，而是對英國長久經營埃及的成就之承認。

## 伍、結論：埃及政策與自由派帝國主義的發皇

經過了一八九三年至一八九四年的事件，英國統治埃及的模式與機制產生極大的變更。自一八八二年英國佔領埃及以來，英國統領埃及的順當，有賴埃及總督的服從與配合，而英國在握有至高權威(即決策權)後，對埃及當地領袖的傳統權利，也加以承認和保障，二者各取所需而能相安無事。約略言之，英國在埃及統而不治，埃及政府則治而不統。雙方均需有所節制，尊重另一方的權益。這個統治機制與英埃關係常不能以「名正言順」或「在其位謀其政」的準則加以規範或理解；它的微妙與弱點乃源於英國以武力強佔埃及，不得土耳其政府、歐洲列強與埃及人民的認同，而另一方面，埃及則企圖建立獨立的國家，但也未能獲得列強的支持，擺脫土耳其的宗主權和反抗英國的控制力。在各方皆不能以實力和法律雙重確保自己的地位和利益時，埃及問題只能

---

<sup>107</sup> 一八九四年五月，英國外交部長 Lord Kimberley(此時羅斯柏理已轉任首相)便說：「當埃及總督對我歸順時，我們並無必要支持土耳其蘇丹，來打壓埃及總督。」見 Kimberley to Currie, 22 May 1894, quoted in T. B. Miller, *op. cit.*, p. 11.

懸而不決，埃及政務也只能在現實的條件下，名實不副地運作。英國在埃及的權益既不能名實兼得，其政策總以有效與否為取向。

對英國政府而言，埃及的安定與繁榮正是建立在一八八二年以來英埃的合作與互惠關係上。如今艾伯斯的挑戰破壞了這個有效運作的統治機制，引發嚴重的政治危機，迫使英國必須調整其統領埃及的模式。其法即是將埃及導向準保護地，使埃及總督更形同虛位元首。這對艾伯斯而言顯然不利，但對英國而言亦未必無害，因為英國向來傾向非正式帝國 (informal empire) 的控制模式，其利益為商業而非政治；英國在強化對埃控制後，為維護其政治威權，須付出更高的實質代價(如駐軍與經費)，以保障其原有的經濟利益。同時，進一步控制埃及，即表示在外交上與法國的對立將更惡化，而使英國必須開始在歐洲列強中，尋求結盟的對象，而不得不向三國同盟示好，放棄其長久孤立的光榮與便利。反觀艾伯斯所以做出如此無利又無效的反英行為，一方面固然是出於民族主義的立場，另一方面實因其年幼(即位時尚不滿十八)無知，不解英埃特殊關係下政治更高的複雜性與微妙處所致。因為埃及總督的權利與埃及人民的利益，未必因英國的佔領而減少，反可因英國的介入而提升。蓋英國在面對列強的抗衡與土耳其的敵意時，其扶持埃及步上自治乃至獨立的地位，正是一招有效的外交策略，可以保衛英國在近東的利益；至少它對埃及民族主義的支持，也可獲得歐洲輿論的肯定。英國在埃利益不外二者：一是商業利益，尤其是蘇伊士運河股權，另一是戰略價值，尤其是蘇伊士運河的航行控制。這些利益都無庸以直接統治埃及人民來換取，因此艾伯斯政潮與邊境事件的結果，其實不是埃及之失與英國之得，而是雙方的得不償失。只是當秘密揭穿——如「國王的新衣」為稚幼無忌的孩童所譏笑——而情勢轉化後，英國不得不

有所應變，對埃進一步的控制至此已勢在必行，即使是自由主義者面臨此變局，也只得拋棄理想，挺身捍衛帝國利益。

當一八九二年英國大選時，格蘭斯敦理想色彩鮮明的自由主義立場與反帝國主義態度，曾教許多英國人擔心自由黨一旦主政，將使英國在海外的勢力削弱。然這番顧慮並未使自由黨的支持率下降而落敗，因為眾人相信格蘭斯敦政府必得重用名望甚高的羅斯柏理，而所謂重用即是任命他為外交部長，蓋此為十九世紀後期英國政界中，首相之下最富權勢與重要性的職位；一般認為羅斯柏理強硬的帝國政策，必能矯正格蘭斯敦在外交上的「軟弱」作風，使自由黨政府對外仍能有所作為。因此，二人的組合在內政需要改革（自由主義）而外交需要拓展（帝國主義）的時代中，成了眾望所歸的絕配。格蘭斯敦組閣時，果然在外交部長人選上不作第二人想——雖充滿無奈，在外交政策上也只能處處成全羅斯柏理的想法。所謂民主與責任政治，於此便清楚呈現。當羅斯柏理在內閣會議中為其主張力爭，而取得閣員們的認可與同意後，羅斯柏理的意見即變成國家的政策，首相便須在公開場合為其辯護，這成了格蘭斯敦晚年執政時精神上極大的折磨。<sup>108</sup> 在埃及問題上，格蘭斯敦的撤兵主張在羅斯柏理主掌外交部幾年中，非但不能推動，反而更無實現的希望，而格蘭斯敦卻必須為羅斯柏理的永久佔領政策背書。在此二、三年間（1892-94），保守黨頗肯定自由黨政府的對埃政策，然國會中稱許政府行動的言論盡是針對羅斯柏理而發，但代表政府答辯問題與指責者，卻多是格蘭斯敦，其尷尬處境可想而知。在下議院中，自由黨席位較保守黨僅多四十，自由黨員對於首相的內政多能支持，但對於外交政策卻傾向支持保守黨的路線，而羅斯柏理正是自由黨內這條路線的

---

<sup>108</sup> 論者多認為格蘭斯敦的委曲求全，乃是為了實現其推動愛爾蘭自治的最高理想。

代言人，使得自由黨呈現二元領導的異象。這種二元領導嚴重來說就是分裂。在這個困境下，格蘭斯敦終於在一八九四年三月辭去首相職，正式自政治界退休，而由羅斯柏理接掌政府。在格蘭斯敦去職前，羅斯柏理致函首相，坦言二人理念的差異，與共事的困難。<sup>109</sup> 事實上，這個危機在一八九二年自由黨政府組成時即已伏下。

羅斯柏理出任外交部長後，任事甚為積極，對於推動帝國擴張稍無遲疑。如前言所述，早在一八八五年時，羅斯柏理即被指為「自由派的帝國主義者」；其任外交部任內所為，正具體向世人展示何為「自由派的帝國主義」。一八九五年時羅斯柏理更公開闡釋此詞之意。他說「自由派的帝國主義」意涵有五：一、維護大英帝國；二、為國人開闢移民新天地；三、掃除奴隸販賣的惡風；四、推展傳教事業；五、發展英國商業。<sup>110</sup> 其說展現霸氣與人道，涵蓋「新帝國主義」各類論調，實際上已與一般帝國主義無別，並無「自由派」的特殊取向。其實在十九世紀後期英國政黨意識型態成熟之際，自由主義者與保守主義者的帝國思想相去甚遠，但兩黨在帝國政策上並無清楚判分，這是因為現實政治中並不能為政黨理念犧牲國家利益，因此佔領埃及的軍事行動是在理想自由主義者格蘭斯敦主政時發動，而得到保守黨普遍的肯定。自由黨與保守黨的帝國主義差別，原是在於理論思想的層次與行動手段的激進程度上。但到了羅斯柏理的時代，自由黨的帝國主義已經和保守黨的帝國主義，在說法(非關理論)與行為上均甚

---

<sup>109</sup> BL, Add. MSS. 44290, Gladstone Papers, vol. CCV, Rosebery to Gladstone, 24 February 1894. 在此信中，羅斯柏理說他與格蘭斯敦不只是「意見相左」而已，而是「信仰」不同。

<sup>110</sup> A Speech at the Albert Hall, 5 July 1895. See *The Foreign Policy of Lord Rosebery: Two Chapters in Recent Politics 1886 and 1892-5*, "Appendix," p. 75.

為一致。所謂「自由派的帝國主義」只是一種政治態度的宣告——擁護與追求大英帝國利益，而不是政治理論的提出或調整。羅斯柏理對「自由派的帝國主義」之說明，全以政策路線為依據，而不論及思想層次，就是表示自由黨政府在內政上——對待同胞——仍主自由主義原則，但在外交上——對抗列強——絕不奢談以德服人，而將權利拱手讓人。

簡單說，「自由派的帝國主義」不是要講「義利兩全」，也不是要論「先義後利」，而是「義不妨利」。一八九三年至一八九四年的埃及事件，迫使自由黨政府在「不進則退」的兩難中抉擇，為政之道在此僅能捨義就利，這是格蘭斯敦也無可如何之事，何況在群眾政治中，羅斯柏理所代表的是強勢的民意。一八八五年戈登將軍 (General Gordon) 在蘇丹遇難所引發的英國政治風暴，已顯示自由黨溫和的帝國政策不為大眾所信任和支持。<sup>111</sup> 因此，格蘭斯敦與羅斯柏理之爭，並非意氣或個人恩怨的問題，而是自由黨的政治前途問題。在此事後，自由黨理想派更加失勢。格蘭斯敦下台後，接任者不是黨內同為理想派的大將哈考特(格蘭斯敦的親密戰友)，而是被哈考特斥為充滿「無知激情」(“ignorant fanaticism”)<sup>112</sup> 的羅斯柏理，便透露出如此的消息。據克魯摩觀察，「自由派的帝國主義者」此時已儼然形成一黨，自由黨政府的外交表現，已可與保守黨媲美。<sup>113</sup> 而反對帝國擴張的人也指責自由黨的外交決策者，已和保守黨成為一丘之貉。<sup>114</sup>

<sup>111</sup> 參見王世宗，“Parliament and Empire: British Policy in Egypt, 1882-85”，《歐美研究》30：1（2000年3月），頁78-86。

<sup>112</sup> Quoted in E. D. Steele, “Britain and Egypt 1882-1914: The Containment of Islamic Nationalism,” in K. M. Wilson ed., *Imperialism and Nationalism in the Middle East: The Anglo-Egyptian Experience 1882-1982* (London: Mansell, 1983), p. 17.

<sup>113</sup> Lord Cromer, *Abbas II*, pp. 30 & 32.

<sup>114</sup> W. S. Blunt, *My Diaries*, Part I, p. 98.



一八九三年至一八九四年的埃及事件，一方面是促進英國自由派帝國主義的原因，另一方面則是自由派帝國主義發展的結果。一八八二年以來，自由黨政府對埃及問題一直採取謹慎節制與息事寧人的態度，「撤出埃及」是其一貫的政策口號。但至艾伯斯事件後，羅斯柏理開始提出強佔不去的說法，暗示了自由黨作風的丕變。他說英國有四個理由不撤兵：一、除卻開羅與亞歷山大城之外，並無證據顯示埃及人民對英國懷有明顯的反感；二、英國要怎麼做，不是由埃及總督來決定的；三、英國在埃及十年建設有成，不能輕言放棄；四、英國一旦撤出埃及，當地必立刻陷入亂局。<sup>115</sup> 羅斯柏理的四項理由皆屬英國主觀的感受，自由派帝國主義者的霸氣，在此看來顯較保守黨溫和派有過之而無不及。在一八九二年以後英國強化其對埃及的控制，不僅表現在增兵一舉，且表現在英國開始介入埃及司法部與內政部人事與行政(原享高度的自治權)的行動上；同時，本土的名流豪紳也愈來愈不受重用。至一八九八年時，埃及政府各部門均已控於英人「顧問」手中。撤出埃及的呼聲至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早已成為絕響，而英國政界對埃及問題的討論，也多只限於行政措施的末節。顯然，當自由黨與保守黨在帝國政策上已無重大歧見時，埃及問題在英國的政黨政治中，也就失去了攻防的陣地。

王世宗，台灣大學歷史系副教授，英國里茲大學(University of Leeds)歷史系博士(1994)，專攻十九世紀後期英國帝國政策。最近發表的相關論文是“Parliament and Empire: British Policy in Egypt, 1882-85”(《歐美研究》30：1，2000)，其目前研究課題是十九世紀末英國的憂患意識與帝國政策新猷。

---

<sup>115</sup> PRO, FO633/7/122, Rosebery to Cromer, 27 January 1893.

## 參考文獻

- Authorship unknown. 1901. *The Foreign Policy of Lord Rosebery: Two Chapters in Recent Politics 1886 and 1892-5*. London: Arthur L. Humphrey.
- Bahlman, D. W. R., ed. 1993. *The Diary of Sir Edward Walter Hamilton, 1885-1906*. Hull: The University of Hull Press.
- Blunt, W. S. 1894. "The Khedive and Lord Cromer." *The Nineteenth Century*, Vol. XXXV, No. CCIV, pp. 177-188.
- \_\_\_\_\_. 1919. *My Diaries*, Part I. London: Martin Secker.
- Brooks, David, ed. 1986. *The Destruction of Lord Rosebery*. London: The Historian's Press.
- Buckle, G. E., ed. 1931. *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 Third Series, Vol. II. London: John Murray.
- Crewe, Lord. 1931. *Lord Rosebery*. London: John Murray.
- Cromer, Lord. 1908. *Modern Egypt*. London: Macmillan.
- \_\_\_\_\_. 1915. *Abbas II*. London: Macmillan.
- Gardiner, A. G. 1923. *The Life of Sir William Harcourt*. London: Constable.
- Guedalla, Philip, ed. 1933. *The Queen and Mr. Gladstone*.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1933.
- Hammond, J. L. and M. R. D. Foot. 1952. *Gladstone and Liberalism*. London: English Universities Press.
- James, R. R. 1963. *Rosebery*.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 MacKenzie, J. M. 1984. *Propaganda and Empire: The Manipulation of British Public Opinion, 1880-1960*.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Mansfield, Peter. 1971. *The British in Egypt*.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 Marlowe, John. 1970. *Cromer in Egypt*. London: Elek.
- Martel, Gordon. 1986. *Imperial Diplomacy: Rosebery and the Failure of Foreign Policy*. London: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 Matthew, H. C. G. 1995. *Gladstone, 1875-1898*.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_\_\_\_\_, ed. 1990. *The Gladstone Diaries, Vol. XIII*.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Miller, T. B. 1960. "The Egyptian Question and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892-94."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 XXXII, No. 1, pp. 1-15.
- Milner, Alfred. 1892. *England in Egypt*. London: Edward Arnold.
- Morley, John. 1903. *The Life of William Ewart Gladstone*. London: Macmillan.
- Penson, L. M. 1943. "The New Course i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882-1902."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Fourth Series*, Vol. XXV, pp. 121-138.
- Raymond, E. T. 1923. *The Man of Promise: Lord Rosebery*. London: T. Fisher Unwin.
- Tignor, R. L. 1966. *Modernization and British Colonial Rule in Egypt, 1882-1914*.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Wang, Shih-tsung (王世宗). 1996. "Lord Salisbury and the Justification of the British Position in Egypt." *EurAmerica*, Vol. 26, No.4, pp. 139-171.
- Wang, Shih-tsung (王世宗). 2000. "Parliament and Empire: British Policy in Egypt, 1882-85." *EurAmerica*, Vol. 30, No.1, pp. 35-107.
- Welcher, Jr., W. M. 1988. *No Country for a Gentleman: British Rule in Egypt, 1883-1907*. New York: Greenwood.
- Wilson, K. M., ed. 1983. *Imperialism and Nationalism in the Middle East: The Anglo-Egyptian Experience 1882-1982*. London: Mansell.
- Winstanley, M. J. 1990. *Gladstone and the Liberal Party*. London: Routledge.

## **“Liberal Imperialism”: British Policy in Egypt, 1893-1894**

*Wang Shih-tsung*

### **Abstract**

Essentially, liberalism contradicts imperialism; but in diplomacy and *Realpolitik* liberals rarely stand against imperial enterprises. Such is the case of the British Liberal Party during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Focused on Lord Rosebery's policy towards Egypt under Gladstone's last ministry, this thesis argues that, as far as foreign policy was concerned, the Liberals in the early 1890s discarded their “outdated” beliefs in rationalism and pacifism, and assumed an attitude not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ir political opponents - the Conservative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political atmosphere in 1893, when Lord Rosebery and Abbas Hilmi II took office as the British Foreign Secretary and the new khedive respectively, and the so-called Abbas' Coup in 1893 and the Frontier Incident in 1894, to show how “Liberal Imperialism” developed and the British occupation of Egypt became “permanent,” in spite of strong Liberal idealist opposition. In conclusion,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e British policy of “Liberal Imperialism” in dealing with the Egyptian question, the Liberal Party was losing touch with liberalism and becoming more “conservative,” and that while achieving more popularity with the British public in this way, the Liberal Party grievously alienated its fundamentalist supporters, which detracted from its merit and worth as an independent political group.

**Key Words:** Gladstone, Rosebery, Cromer, Abbas' Coup, Frontier Incident